
新世纪湖北女作家创作论

李奇志 漆咏德

(1. 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23;

2.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湖北女作家的创作呈现出繁荣态势。她们的创作,或在底层书写与扬“主旋律”的变奏中呈现出开放态势,或在婚恋图景与心理掘进的交汇中展示情爱聚焦,或在武汉书写与周边辐射的呼应中书写地域关照。凡此种种,构成了新世纪以来湖北女作家创作的总体趋势和别样风景。

【关键词】新世纪;湖北女作家;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6)11-0106-05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方方、池莉在新写实浪潮中的双星闪耀,加之刘醒龙、邓一光的横空出世,湖北文学一改80年代以前远远落后于全国文学的面貌,以骄人的实绩赢得了全国读者的瞩目。在湖北文学中,女作家的创作实绩颇丰。进入新世纪,湖北女作家的创作队伍更趋庞大,除了方方、池莉成为湖北文坛的领军人物外,与她们同时代的沈虹光、胡榴明、魏光焰、叶梅、华姿、王建琳、冯慧、梁小琳的创作亦收获不小;“60后”的林白、姚鄂梅、鲁西西(阿毛)、千里烟(董明侠)、姜燕鸣、汪忠杰、陈冰等作品迭出;“70后”的王晓英、王芸、桢理、李榕、秦晓梅、童喜喜(金容)、郭海燕、望见蓉、许玲琴、汪静玉、叶倾城(胡庆云)、邓元梅(梅子)、麦琪、李榕,“80后”的刘敏(紫百合)、苏瓷瓷……则更为青春活跃,备受注目。正是她们,构成了阵容强大的湖北女作家方阵,成为全国文坛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为湖北文学乃至全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下面试对新世纪以来的湖北女作家的主要创作特点进行综合梳理,以期能引发对她们的深入研究。

一、开放态势:底层书写与扬“主旋律”

底层书写是新世纪文学创作的重要现象之一。在这场全国性的文学浪潮中,湖北作家赢得了全国的关注,而其中的女性作品占据有半壁江山。除方方、池莉、沈虹光在底层书写中成就颇大之外,许多女作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如王晓英在她的诗中将《民工》和《捡垃圾的人》在细节的画面定格中呈现出底层的弱小和城市的冷漠;许玲琴在《打工的雨》中揭开了《开的士的弟弟》隐藏在城市光鲜外表下弱势群体人群的伤疤;姚鄂梅在《致乡村少年》和《大约在冬季》中关注农村底层少年的无助和艰难,王君在《关闭》的《枸叶树》中抚慰进城务工妇女身心创伤……她们的底层创作不容忽视。

大致而言,新世纪湖北女作家的底层叙事主要显示出两方面的特色:聚焦底层中年女性的生活。不能忽略的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改革调整与产业升级提速对于整个社会都构成了冲击。而受到冲击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中年女性——她们与男人比没有性别上的优势,与年青人比没有年龄与知识上的优势,所以在下岗失业的人群中,中年女性的比例是最大的。方方的

作者简介:李奇志(1963—),女,文学博士,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漆咏德(1963—),男,文学博士,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新世纪湖北女作家创作研究”(2014182)。

底层写作往往由此展开：刘春梅（《中北路空无一人》）的生活状态在底层中年女性中具有相当的普泛性：下岗、艰辛、贫穷、无爱、无助、无奈……如果说刘春梅们的底层生活是日常的散淡的话，那么，在何汉晴（《出门寻死》）和李宝莉（《万箭穿心》）的形象塑造中则寄予着方方对底层生存的某种荒诞性的哲学思考：何汉晴下岗在家操持家务多年后，对日常生活的机械性产生了欲解不能的迷惑，于是，她欲以死求解。反讽的是，在求死的过程中，她的形而上的求死欲念不断被形而下的惯性生活流程所打断，最后却死不由己，重回旧日生活轨道。李宝莉在背叛自己的丈夫自杀后，做了女“扁担”，甚至不惜卖血，以供养年迈的公婆和上学儿子的生活；但最后却被儿子赶出家门。这种典型的底层人生的荒诞剧，让人在含泪的微笑中对生活的残酷和恐惧发出沉重的叹息。与方方对底层生活的荒诞意识的表达不同，青年女作家王芸的小说却带给我们强大的精神冲击力，她执意于从底层中年妇女的人生中发掘出一种不平凡的精神，将这种顽强、坚韧、求善的品质书写得光芒凛然。《黑色的蚯蚓》和《虞兮虞兮》可以说是姊妹篇，樊松子、余熙这两个下岗女工，生存和家庭婚姻都是艰辛的、苦难的。但可贵的是这些底层妇女都选择坚强与积极的应对，张扬生命的价值，并最终超越了灰暗的环境。

底层叙述的新探索。底层如何被表述是一个理论上不断争论的焦点问题。马克思当年论述复辟时代的法国农民——“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1] (p18)}——的观点在今天中国的底层叙述中仍然存在：既在叙述者（作者）与底层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话语关系，叙述者（作者）总是把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强加给底层，致使底层逐渐沦为叙述者（作者）“话语”的客体，而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意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林白《妇女闲聊录》对底层叙述方式有了新探索，叙述的“原生态”是该作品的最大亮点。作者退位，用一种“原生态”的忠实记录方式，通过一个伶牙俐齿的乡村中年妇女木珍不免粗野的底层话语，向读者呈现了“王榨”村的原汁原味的乡野生活。换句话说，《妇女闲聊录》摆脱了他者叙述中或苦难化或道德化的低层叙述模式，力图进入一种低层“自叙”的状态。也正由于此，叙述的“狂欢”化，成为了该作叙述的另一特征。“所谓狂欢感，实质上就是一种自由感，在狂欢化的世界里，脱冕神圣、解构权威、人与人平等相处、亲密接触，人性获得了解放。”^{[2] (p178)}于是，经由底层的自述，我们看到的是：“王榨”人的沸反盈天、鸡飞狗跳、鲜活泼辣和对生活满不在乎的自适感。林白叙述方式的“下降”让知识分子的立场基本退位，而把叙事的重心真正落在底层民众的各式人物形象上，并在美学意义上重建了他们的生活，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对主旋律的弘扬是新世纪湖北女作家创作开放态势的另一表现。其代表作家是王建琳和梅洁。在当今文坛，王建琳是一位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而引人关注的女作家。2005年其长篇小说《风骚的唐白河》问世，被评论界视为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小说既直面现实，将视点聚焦于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困惑和农民的尴尬，同时又有预言意识，凸显了乡村民众突破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农民利益矛盾的重围，坚定不移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道路的决心。王建琳有敏锐的社会改革触觉，小说出版后不久，国家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目标，而王建琳的唐白河新农村建设已提早“一脚踏到这个点上”了。随后王建琳写出了《陌上桑》、《合欢树》、《六月激流》、《玉屏山》、《永乐春》、《木鱼镇》等中篇，还有长篇《迷离的滚水河》问世，这些作品构成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题材的创作系列，让我们看到20世纪40年代丁玲开创的女作家写社会变革重大题材的文学现象在新世纪的湖北女作家创作中得以延续，并且重放光彩。

如果说王建琳用小说为农村变革“吼”了一嗓子的话，那么，湖北十堰籍女作家梅洁则用报告文学的形式为郧阳人民为了国家建设发展大局付出巨大牺牲的民族精神做了时代的书记员。继纪实文学《山苍苍，水茫茫——鄂西北论》后，2005年，梅洁完成了大型纪实报告文学《大江北去》。该作聚焦于中国水之命运、中国移民之命运、中国水利工程之命运，展现的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70万移民的巨大牺牲和奉献，文章气势如虹，格调悲怆，笔力遒劲，饱蘸深情地为沉默、坚忍的山之魂、民之魂讴歌，对国家南水北调工程而言，具有树碑立传的史诗意义。

二、情爱聚焦：婚恋图景与心理掘进

“情爱系列”是新世纪湖北女作家创作中值得重视的一部分。湖北地处中部，有千湖之省美称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特色，似乎为湖北女作家的情爱书写导引了“中庸”和“柔和”的方向：在两性关系中，湖北女性写作的对立意识较弱，极少把男性或是男权当作女性世界的“压迫者”或“他者”，她们更钟情于让男女两性在文本中互为镜像，营造出两性之间“雌雄同体”的

张力结构；在人物设置上，湖北女性写作更多地聚集于女性自身，试图挖掘出更隐蔽的女性意识和女性情爱话题；在审美意识上，湖北女性写作一般习惯于在日常叙事中揉进女性体验从而给读者带来新异的审美享受。

现代生活的问题婚恋。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各种“后”思潮的影响，人的各种欲望空前膨胀，凡此种种，都使爱情的神圣逐日被现实的平庸和设计所消解，与此相应的情爱书写，也表现出理性消弭后爱情的幻灭和绝望。新世纪以来湖北女性创作中的情爱言说表现了这一发展趋势。

诗人阿毛总结了《现在的爱情》的状况：“到处都是金光银光/闪耀，却照不到爱情/……现在的爱情像眨眼，一闪就不见。”^{[3] (p68)}发出了《我们不能靠爱情活着》的哀叹。阿毛的哀叹，在许多女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回响和解释。郭海燕喜欢在“两性情事”的故事模式中细致把玩、剖析女性的情爱纠结与情爱梦幻。喻言（《如梦令》）、李钰（《指尖庄蝶》）、朱玲玲（《掌心里的风》）和冷渝（《殊途》）等女性有大致相似的情感经验：婚姻的不尽如意、心理郁积着无奈和愤懑，时常幻想平庸生活会有令人意外的刺激性浪花涌现，故而婚外情成为她们的向往。郭海燕敏锐地把握住了当下女性的情感隐秘处：在呈现她们的情欲心理、情欲行为时，主要把这种欲望归因于女性情感困惑、精神困境的外现，因而伦理之外的性爱往往被作者视为是女性一种精神和身体的疗救，是女主人公对生活不甘不满的慰藉和补偿；她们企图经由婚外的情爱来找回生活的力量与激情，但这种为爱而爱之情欲终究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缓解，一种抓不住的虚幻，曲终人散后她们重新回归了家庭，在与丈夫那种貌似无趣而实则互为依赖的亲情关系找到了人生的归宿。

如果说郭海燕笔下的女性人物可以概括为富于幻想而寻求刺激的精致女性的话，那么姚鄂梅则既有郭海燕的现实观照，其女性抒写的范围也视域更加宽广。其作品少有一般女性主义写作中的欲望叙事，也尽量避免纯粹私人的经验碎片、想象世界的描述。她注重叙事的情节性，故事的完整性，并借此来传达自己对情爱的独特见解。《妇女节的秘密》《白话雾落》《大路朝天》等作品呈现出许多女性现代生活中问题婚恋的新质，区别于80 年代张洁、张欣等人的女性“社会问题”小说，也区别于陈染、林白等人90 年代女性“私人话语”的小说。这种区别既表现在姚鄂梅将女性的个体生存、情爱境遇中的艰难和问题并不主要归罪于社会环境与男性权威禁锢的作用，又表现在她从不过分凸显女性自身思想观念的困惑与迷茫。在现实社会与女性个体之间，她更注重两者的原生态势所呈现出的平衡力量，多以独特的人物性格、命运和形象的对比，加之对生活积极向上的暖色，生动的故事情节拟构，导出女性于困顿绝望处自我救赎的艰难历程和绚丽光芒。

除此之外，许多女作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情爱问题进行了探讨。方方的《树树皆秋色》、望见蓉的长篇小说《爱情斑马线》等作品叙写知识女性追求理想爱情的执着与坎坷，迷茫与困惑，笔调伤感，构思奇巧。池莉的《水与火的缠绵》《所以》等经由都市男女的爱情传奇，完成了作者对当代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思考。千里烟（董明侠）或在《爱情豆豆》《期货爱情》《爱情出口》中呈现都市生活的“零余者”的进取精神、生活状态、情爱想往；或在《我和母亲的情人》中标示对爱情价值性、超越性的追求，其浪漫古典的情怀使作品显示了湖北“60 后”作家特有的精神“亮色”。

女性心理的深度掘进。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于女性“自我”驾轻就熟地剖白与言说的女性写作现象出现。许多女作家执着于女性自身的体验，镜像、女同性恋、神秘主义、自戕等元素在陈染、林白等作家的小说中随处可见。苏瓷瓷是新世纪湖北女作家在这一方面的代表，可以说，其创作在向女性幽暗的心理空间敞开的同时，基本上向繁复纷扰的外部社会封闭了。其小说背景基本上是精神病院亦或精神病症，氛围则是忧郁、孤独、颓废、被动的，人物主要是青年女性，如女护士丁小菲、老处女沈郁、妙龄白领苏寒等。苏瓷瓷对这些女性的心理探寻主要通过两个向度展开：一是经由疾病以隐喻女性幽暗深微的情爱心理。《第九夜》首先作出了探索的呈示：在男友患精神病后，丁小菲设法进了精神病院当护士，企图唤醒她的男友，她的行动近于疯狂：痴迷、恋物、变态、自虐、受虐、绝望，但所有的努力都是虚无：男友完全不知道她是谁，爱情更无从谈起。结果是她选择变成男友的同类，两人一起轰轰烈烈地死去以祭奠和延续他们的爱情。在后来的作品中，精神疾病与情爱心理之间的联系隐喻，是苏瓷瓷不断探索的题材：如《伴娘》中马蘅少女时期的叛逆、疯狂，长大后对平实人生的追寻，都是主人公唐凄凄自我追求的隐喻表达；在《亲爱的弟弟，我爱你》中，姐姐叶绿病态、阴郁、沉寂，弟弟则健康、明朗、好动，后者实际上是前者所追求的另一个“幻想自我”的心理隐喻。二是流转于人物的“常态”和“非常态”之间，以寻求曲折繁复心理的被理

解之途经。作为叙事者，苏瓷瓷对人物的“非常态”抱有天然的理解和同情，所以其小说对“非常态”的幽暗意识有突出的叙写，更重要的是，她还努力让些许的“理解之光”——常态的渴求沟通的心愿，常态的渴求认同的思维——照耀到“非常态”的幽暗中，企图使人性的光明清晰与阴暗曲折心理之间有某种沟通理解之通道。由此，苏瓷瓷作品的意义凸显：带引读者潜入“精神不正常”人的生活场景和意识领域，描述出人类特别是女性幽暗心理的丰厚内容和立体层次，让所谓正常的读者窥见“他者”隐喻以及与喻体合二为一的心理事实；进而导出读者对生活的疑惑或质问，从而为稳定的社会文化秩序导入某些异质因素，使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骤然“陌生化”，生发出对既定社会文化结构和心理结构的质疑和新识。

与苏瓷瓷相比，桢理更注重常人内心的波澜起伏，她具有从容的叙事能力，从她文字中表现出来的从容态度会轻而易举地拨动读者内心深处的琴弦，直至完全陷入其中。其长篇处女作《爱情细节》关注的是婚外情故事中生活本身的逻辑和生命的本真状态；《拐弯》准确地传达出生活优越而内心空虚的全职太太的欲望、失落、紧张、徘徊以及犹豫。《女人花》的心理叙写更胜一筹：围绕着核心意象“乳房”，把青春期男女的性爱、畸恋、激情、纠缠、背叛等心理元素融合在好看的故事中，让心理在故事中演进，让故事在心理中深化，青春的疯狂，令人震撼，也令人迷醉。

三、地域关照：武汉书写与周边辐射

从20世纪以来，湖北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构成了以武汉为中心，以长江为纽带，以鄂东、鄂西为两翼的文学发展模式。新世纪以来，湖北女作家的武汉书写有了大的收获和突破。

首先，在历时性上，武汉书写具有了穿越百年的历史纵深感，这是新世纪以来湖北女性创作的大收获。上世纪80年代以来，湖北女作家开始武汉书写，读者和学界的一般评价是：她们较擅长书写类似于《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风景》这样以武汉市民的凡俗人生为题材的小说，即便是较有深度的方方，除却上述题材外，其所擅长的知识分子题材的历史主义况味也是有所欠缺的。进入新世纪，这种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武昌城》是方方2006年的长篇，其所呈现的刻画历史和城市的力度，是其作品中所少见的。该作讲述1926年秋天北伐军进攻武昌城，城内数十万军民被围困的一段历史。但作品不仅有武昌被围困历史的宏大叙事，更有在战火夹击中普通武昌市民惨痛的生存现状，恐惧、饥饿、杀戮是“围城”的生活常态，正是这些日常场景与宏大叙事相融相生，使得《武昌城》既具有细节的真实和场景还原的意味，也有历史况味和思想厚度，其意蕴深厚的历史厚重感和毛茸茸的历史质感均是不可小觑的。此外，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也显示了方方创作的良好转型态势。此长篇描写了一个汉剧女“戏子”的漫长人生故事。然而，她并没有把该作写成一部单纯的女性故事文本，而是赋予该作以一种颇有历史感的叙述气度。这种气度表现在作品纵横捭阖地将武汉的城市发展史嵌入到女性个人成长史的叙述中。女主人公们生活的20世纪20-80年代，恰是现代意义上的武汉的黄金发展期，水上灯、玫瑰红这些汉剧女艺人之所以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光彩与现代表武汉都市文化的勃兴有直接联系，市民阶层的兴起，各种娱乐场所的开设，地方戏剧的兴盛等等，都是中国现代城市表征；而这些在九省通衢的武汉城市发展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水在时间之下》紧扣住“武汉”都市之能指，将女性的辉煌艰难的戏剧人生与城市的发展史交融渗透，使得作品的意味格外丰饶。

其次，在武汉书写的共时空间上，新世纪以来的湖北女性创作也体现出不同以往的多向拓展性。在创作样式上门类齐全。小说成就最大，以往缺乏的长篇有长足进步，除了上述方方的两部长篇以外，池莉的《所以》，姜燕鸣的《汉口之春》《倾城》，阿毛的长篇小说集《谁带我回家》都是不错的佳构。以散文述写武汉的队伍在壮大：方方的武汉历史随笔，胡榴明的武汉市井随笔，池莉的以《立》为主体的育儿经，姜燕鸣的武汉新城蓝图勾勒，阿毛的唯美电影散文《影像的火车》，叶倾城的“闺中密友”、“心灵鸡汤”、“心灵笔记本”散文，都从不同侧面闪耀出武汉城的无穷魅力。在创作题材上出现了以武汉为专门写作对象的作家，如姜燕鸣。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姜燕鸣一直致力于以老汉口为背景的小说创作，她坚持：“对于一直生长的汉口，有必要进一步探寻和挖掘她丰富而深厚的历史蕴涵。”^[4]其老汉口系列中篇和长篇，刻画老汉口女性群像，所谓乱世情殇说往事，委婉道来，故事出奇制胜，被多种选刊转载的同时，引起文坛了较多的关注。纵观武汉书写的各种题材、各种文体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武汉城里的“她”，池莉写过一篇反映汉口三代女性生活的小说叫《她的城》，可以说，这篇小说的名字概括了所有女作家武汉书写的人物地域特征和人物个性特征。这些女主人公与武

汉城相互需要，相互映衬，互为隐喻，她们是武汉最和谐最美丽的景观，更是武汉内蕴的精神价值所在，所以作家说武汉是“她的城”。

围绕着中心城市武汉，其余广大的湖北地区的女作家，也各自叙述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故事。

在湖北众多地区中，鄂西南的女作家颇有特色，我们主要以她们的创作为例来阐释新世纪女作家的地域创作特色。鄂西南女作家多数持守着“寻根”的传统，从一方山水中寻根，从本土文化中寻根、从传统和历史的交汇中寻根，是她们创作的基本特色，于是，巴楚文化与土苗文化的炫目，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胶着，都呈现在了其创作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鄂西南政治文化中心宜昌涌现出了一大批女作家，她们中大约有80人是宜昌市作协会员，占市作协会员的23%左右。她们人才济济，梯队合理；在创作上门类齐全，群芳竞艳。写小说的有姚鄂梅、郭海燕、朱朝敏、刘抗美、李晓梅、汪淑琴；写散文的有秦晓梅、王玲儿、郑华蓉、黄晔、刘伟华、陈景杰等；写诗词的有董梅、徐述红、龙莉蓉、周京媛、胡定芳等。在创作内容上，她们呼应时代，追求真善美，反映现实，直面人生；尤其关注女性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命运。

相较于宜昌女作家创作的繁荣，鄂西南恩施等地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整体创作势头是比较弱的，但单个作家却有很突出的，如叶梅。上世纪90年代，土家族女作家叶梅的崛起是土家族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进入新世纪，叶梅创作了《回到恩施》《最后的土司》《五月飞蛾》《山上有洞》《乡姑李云霞的故事》《快活》等中篇小说，这是她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使她一跃成为当下全国土家族文学最优秀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叶梅看来：“土家族跟其他民族一样，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宝藏，我肯定会着力去开掘。”^[5] (p232) 其所有的作品都努力挖掘土家族历史文化的内在精髓，表现土家人刚烈勇武、重义多情等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她的小说或近距离多侧面地书写土家人的现实生活、风土民俗、思想情感，或远距离多角度地描摹土家人远古时代、土司时期、改土归流、新中国成立前后等时代变迁中的历史文化生活，尤其是大量地契入对土家人生存环境、生活方式、英雄故事、历史传说、民族心理、民族风俗的述写，从而立体地呈现出土家人特有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1999.

[2][苏联]巴赫金. 拉伯雷研究[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3]阿毛. 在文字中奔跑[J]. 芳草, 2005, (02).

[4]艳阳. 姜燕鸣作品再获中国作协重点扶持[N]. 武汉晚报, 2013-7-11.

[5]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叶梅研究专集[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